

董子竹 谈 心学文化丛书



金刚经

到底说什么

——
与南怀瑾商榷

《金刚经》究竟应该如何理解？
大德们的高论是否正确？

董子竹 著



长江出版传媒
长江文艺出版社

金刚经

到底说什么

——
与南怀瑾商榷



董子竹◎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
金刚经到底说什么/董子竹著.—武汉:长江文艺出版社,2012.10

ISBN 978-7-5354-1967-5

I.金… II.董… III.①文化—研究—中国 ②佛教—文化—研究—中国

IV. G12

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1999)第71706号

策 划  湖北天一国际文化有限公司

公司地址 武汉市雄楚大街268号湖北出版文化城C座6楼

公司网址 <http://www.cjcb-ty.com>

E-mail hb_tianyi@yahoo.com.cn

出 版  长江出版传媒  长江文艺出版社

书 名 金刚经到底说什么

著 者 董子竹

策 划 韩 敏

责任编辑 田敦国

发行电话 027-87679087 87679362 传真:027-87679980 87679300

印 刷 湖北新华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 700毫米×1000毫米 1/16

印 张 21.25

字 数 370千字

版 次 2012年10月第2版 2012年10月第1次印刷
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5354-1967-5

定 价 36.00元

版权所有,盗版必究(举报电话:87679308 87679263)

(图书出现印装问题,本社负责调换)

不废江河万古流

——兼论东方文化的大思维

—

历史实在是个怪物，对于普通的衣食者似乎总是恩惠多一些。你看，不管它千回万转如何曲折多多，衣食者总是一代好似一代，百年胜过世纪。慈禧福报再大，也是无法享受电视飞机的。反过来，历史对于智者大半是极尽嘲弄之能事，尤其是对我们的某些东方文化大师们。

被我们称之为东方文化的古典作家的作品并不太多，赝品半赝品倒是汗牛充栋。但凡被世人公认的东方文化古典作家的作品，如释迦牟尼、孔丘、老子、庄周、孟轲、荀况……其作品都可称之为人类文明的瑰宝。

至于说到他们的后学，尤其是汉代以降，大儒、大真人、大法师、大祖师、大学者……一代当然要传达一代的呼吸，直追先贤者大有人在。高人灭不得，灭高人有罪。但这些人都会因种种原因而生不逢时，知名度不高。至于那些在文化史上被人们称之为划时代的大师们，可以奉承的实在不多，实难与古典作家们相匹敌。

是不是可以这样说，东方文化只作为文化说，其发展似乎走了一条下坡路。开始就是高峰，势必出现下行之势。历史运动真是如此辩证吗？

西方文化恰不是如此。黑格尔、马克思，就不是柏拉图，亚里士多德可以匹敌的，毕达哥拉斯与牛顿、伽利略、爱因斯坦也不可同日而语。

这确实是当代人文学者要好好回答的课题。



这里是不是有一个学风问题，文风问题？

孔丘一生“述而不作”，宁可编史、编书，从未想创造编制自己的“思想体系”。

释迦牟尼说法四十九年，却一再强调，他“无法可说”，谁若认为他有所说法，便是“谤佛”。实无法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

老子说得更干脆：“绝圣弃智，民利百倍。”“圣人无常心，以百姓心为心。”

这正是东方文化精华中的精华。

东方文化古典作家们，反复强调的东方文化的精华、精髓，被一代又一代的东方文化学者、智者抛弃尽净，阉割尽净。

后世学人动辄便想构思一套体系，尤其是宋儒，不管是张载，还是邵康节，还是朱熹，似乎都想构造一个宇宙体系，从这里再生发出一套万古不灭的社会道德伦理教条。体系之大、精致，实在是无所不能。试看“朱子”的杂著便可见其心胸，实可吞食宇宙。屈子作《天问》，正表屈子之博大。然而朱熹却非要一条条答完“天问”，俨然他自己就是“天”了。如此一来，《天问》原有意蕴荡然无存。边读原诗，边读朱注，真是饮一口甘汁，嚼一嘴蜡。真不知这位继圣人要干什么？卖弄学问事小，自以为是“天”，则是可笑至极。在我们今人看来，朱熹对《天问》的回答，实在幼稚之极，永远也进不了大学天文系一年级。

东方文化的古典作家们大半拒绝为人类文明、宇宙规律立法制宪。在他们看来，“宇宙—生命”这个无量系统，自身的运动变化因缘，本身就是真理，就是“天命”、“道”、“阿弥陀佛”（这三个概念的内涵与外延，有一定的区别，此处不详论）。谁又可以为他们立法制宪呢？任何一个个体生命的“知”总是有限，以有限测无限，不是不可知，但绝不可为之立法制宪。东方文化的儒、道、释三家的创始人都非常明白这个道理。他们不是宽容各色观念，求其“和”，便是希望将自己消融到“宇宙—生命”这个无量系统中。不管如何，他们一致认为他们自己的智慧，都是“天命”、“道”、“阿弥陀佛”给予的，他们自己什么都没有，不过是“幻影”、“化身”。在他们身上闪光的智慧，如果因缘合和，也会在其他任何人身上闪现出来。

东方文化本身，不管是儒、道，还是释，都是绝对的开放体系，孔子的



“和”、“中庸”，释迦强调“诸贤圣皆以无为法而有差别”，都说明了这一点。《道德经》说“圣人无常心，以百姓心为心”，实在是开放得连自己也没有了。

东方文化的后人们不能说没有自己的功绩。董仲舒、孔颖达、朱熹……至近现代的曾国藩、梁漱溟……包括我们的南老先生，佛教中、道教中人，更是人才辈出，堪称祖师者大有人在。然而，我以为他们在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时，似乎大半都犯了“过犹不及”的错误。

东方文化不是一种纯理论体系，实践性是东方文化的重要特点。既开放又重实践，真正的东方文化不在书本上，而在中国人，乃至东方人的历史实践中。中国史乃至东方史，就是东方文化本身。我以为这应是符合东方三圣人释迦、老子、孔子的本意的，也应是东方文化体系与西方文化体系大大不同之处。这样，适应历史，适应因缘，合乎人群之需要，合乎世界之潮流，发现历史运动的现实的合理性，则应是东方文化的后学对东方文化传统的真正继承。

可惜的是，自董仲舒以降，儒、道、释三家的大师，在合乎时代之潮流，适应历史之需要，发展、充实东方文化之时，总是希望从开山祖师那里找到几条金科玉律，然后演绎成一套放之四海而皆准、行之万古不移的庞然体系。总是希望为客观历史运动制宪立法，这就不能不从真理走向谬误了。儒家还好一点，后人总还可以驳驳前人，相互之间还可以论辩论辩。佛道两家演化为门禁森严的宗教，内部的探讨几乎绝迹，一旦升为祖师，其言论皆可如释迦金口所说的经典一样，不可更易了。这一切从现代的佛、道两教的存在状态看，已经很能说明问题。佛教中有一位叫太虚的大师，民国年间一直想改革佛教，其结果如何？如果是理论上、教理上的公开论争倒还罢了，发展到动手动脚，便太伤法师们的尊严了，而事实确实如此。太虚的改革内容是否正确是另一个问题，而毫无探讨之风，是佛教死亡的象征。

东方文化在今日世界的地位如何？除了一些汉学家及文学者还觉得东方文化有可贵之处之外，一般人则视其为神秘主义，与原始巫术无二，这实在是个大悲剧。

该是恢复东方文化真面目的时候了。

三

在我们这个号称世界一流的文明古国，翻开一部中国政治史，人们不能不惊讶地发现这样一个奇怪的事实，自秦开始至今，大半是无文化打败有文化，



无“道德”打败有“道德”，蛮夷之族战胜文明之族，流氓土匪战胜秀才、举人、进士之类的大文化人。凡举弘扬文化的朝代几乎都是短命的、衰弱的。

战国时代，秦与其他诸国相比要野蛮得多。如若不然，始皇之母也不会如此放肆。从《诗经》的“秦风”看，秦人应是多有胡风。当时的齐鲁魏赵则文化发达得多。秦却可以一举灭了六国！“仁义”之说广传数百年之后，一个暴政的秦帝国却建立了！刘邦胜秦灭楚，绝非“仁义”的胜利，刘三活活是一个地痞无赖子。董仲舒的“尊孔”，不过是给刘氏祭坛打了一个补丁。直接的丰硕成果，不过是给王莽篡位制造了口实。刘秀是土豪打天下，文化只是个幌子。曹氏父子是文人，其立国不足一个甲子，便为别人做了一碗佳肴。五胡人入中原，彻底是蛮夷胜文明。浮图澄是名震一时的高僧，但也开了僧人与术士幕僚同流合污的先河。五胡人崇佛，未必知佛为何物，只不过是给自己的部族换了一个实力更大的图腾神。姚兴是虔诚的，但做不了中国的阿育王，正史不承认他是一代皇帝，而是一个僭越者。梁武帝是个宗教狂的神经质，佛教中大量的弊端皆以他为起始。达摩弃他而去，正是知他绝非正道。杨坚信佛，儿子却荒淫到极点。李世民凌驾三教之上，用“三教”如同用一个小官僚，绝不是文化治国。武氏是中国史上最信佛的一个女皇，自称金轮转世，次佛一级。其行政为人的成功，却绝不是依了经文教典。唐朝不是无文化，而是多文化，各种文化并存的大开放政策，导致了唐朝前半叶的兴盛。宪宗崇佛，迎佛骨反而令他早崩。武宗灭佛未必没有振兴国家的计算。一种文化学说能让人灭了，原因只在自身的荒谬，何怪“三武”？宋太宗开始大兴文化，国力却愈弱，待张载、邵康节、程氏兄弟名震一时之时，宋也就离死亡不远了，靖康之耻正是在此时。岳飞若以“理学”为蔽履，也不会死在风波亭。以岳飞当时的军事实力完全可以重演一场“陈桥兵变”，如是那样，中国史怕就不是今天这个样子。在大兴理学的同时，中华民族真正强大的力量是不知“理学”为何物的成吉思汗，这位只识弯弓射大雕的英雄，至今还令人胆寒，德国皇帝在数百年后，还叫嚷“黄祸”的可怕。一个还俗和尚登了龙位，弘扬文化的最高水平，是高抬《琵琶记》这样的剧本。顾炎武辈对晚明诸君的“谈心说性”深恶痛绝，高举了“经世致用”的帜子，但真正落实他的理想的文人，却是与他政治目的完全相反的曾国藩！“商女不知亡国恨！”曾氏兄弟真正把儒家文人的“经世致用”的歌子唱绝了。多尔衮是个霸嫂的无耻之徒，对于中国文化的最高知识是《三国演义》，“关公”成了他笼络汉人的廉价赠封，关帝庙一时在全中国如雨后春笋，最后关帝成了一尊古佛，儒道释三家文化在关帝名号中就这样联了姻。



“东方文化”，不知是悲，还是喜。只能称之为“哭笑不得”。这与其说是“文化”，不如说是一场“闹剧”。

我以为钱谦益、洪承畴辈比顾炎武诸君高明多了。虽然史称钱、洪为“贰臣”，但正是这些“贰臣”给剽悍的女真人传授了地道的“东方文化”。满人汉化了，“满族”只剩下一个符号。爱新觉罗的后继人光绪、宣统连生育功能也化掉了。“东方文化”的“化功大法”大胜特胜。顾氏与钱氏如相见于九泉，互相又该说些什么呢？

这似乎是中国史上的一条规律，野蛮打败文明，文明又同化了野蛮。野蛮一旦被同化，其生命力就衰弱至极。文明是文明了，同时成了另一个“野蛮”嘴边的一碗粟。蛮夷之民、村野匹夫、街头流子、还俗和尚、道士，都在眼巴巴等着“东方文化”的兴盛呢！因为“文化”的兴盛就等于当权者被“阉”，取而代之的时候便到了。

“文武之道，一张一弛”，不只是治国之术，怕也是中国史的一个规律。

我们的“新儒家”的大师们对此怕是最能心领神会。

一八四〇年之后，蛮夷之族又来了，“东方文化”在坚船利炮面前落花流水。自此以后，中国人不管是文化人还是非文化人，对于“东方文化”无不视为“鸡肋”，食之无味，弃之可惜。每提到“东方文化”，一股故国之思便油然而生，活生生舍弃了不舍得；再鼓吹起来，不仅是势所不能，情绪也难振作起来。一百多年了，中国人对“东方文化”大半是如此两难。而大量的有识之士还是主张大力学习西方，以为这才是强国之本。然而，一谈起学西方，太多的人又怕真来一个全盘西化。中国文化何去何从？太难了。

进入二十世纪末叶，日本、韩国、台湾、香港、泰国、新加坡……大量有着“东方文化”血统的国家和地区经济腾飞了。一时，“东方文化”的大师们又弹冠相庆，似乎“东方文化”同化“西方文化”的日子又要到来了，我们又可以来一次“化功大法”的表演了。一时“新儒家”、“新理学”、“儒家资本主义”、“佛家社会主义”又漫天飘来。

一九九八年，东南亚金融危机，起自西方金融界的“三剑客”。一时，佛也不保了，菩萨也不佑了，有特异功能的法师们的咒也不灵了，儒家的德，道家的“玄”，都不知干什么去了。

东方，腾飞的东方为什么如此脆弱？

大师也许会说，这是为政者没有大力弘扬东方文化的缘故。到底是东方化不够，还是西方化不够？



最能令东方文化大师们振振有词的是，西方社会时下文化渣滓的泛滥，道德的沦丧，人情的冷漠，尤其是工业化造成的环境污染与破坏……一提起这些例子，大力在全世界振兴东方文化，似乎是理所当然，势所必然。南怀瑾先生也是加入了这个大合唱的。

对于这个合唱，我们以为无可厚非，但行得通行不通？理论是灰色的，生活之树常青，现实历史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了。

弘扬东方文化似乎注定是一曲令人回肠荡气的悲歌。

但是，我们肯定地回答，这只能是“东方文化”大师们的悲歌，而不会是，也不可能是东方文化自身的悲歌。

东方文化无悲歌。真正的东方文化永远是乐观地面向未来。悲歌只属于那些在东方文化中偷梁换柱的人。

四

引一则现代公案。

某台湾高僧赴大陆行脚，于某地，会一年轻人。

年轻人：我当然是神僧下凡。

台湾僧：何以见得？

年轻人：神通俱足。

台湾僧：敢问天眼？

年轻人：二十九寸彩电，接四海风云。

台湾僧：敢问天耳？

年轻人：摩托罗拉，连五洲雷鸣。

台湾僧：神足通？

年轻人：一张机票，足下腾云。

台湾僧：宿命通呢？

年轻人：知今日之我，便晓昨日之我。未曾落地之时，神通早备，若非佛、菩萨转世，何人可有如此福报。

台湾僧：今日之世人大半享受电视、电话，难道皆是佛、菩萨转世？

年轻人：善哉此说，世人皆我道友。满街行走者无非是佛。

台湾僧：南无阿弥陀佛。



年轻人：若无弥陀，尔焉知此“南无阿弥陀佛”六字，尔早是弥陀所眷恋之人，业障障眼，视而不知。
台湾僧汗颜不已。

五

无生命的宇宙是什么？

凡回答者皆是妄想猜测。不可说，不可说。

无“知”之生命是什么？

不可说，不可说。

昨日之“知”，幻影之回忆。

明日之“知”，想象之推测。

当下之“知”，说“知”，知已过；说“知”，知在生。“知”是什么？

毕竟有“知”！

知即生命，知即宇宙。无宇宙无以生，无生无以知；无知何言生？何言宇宙？

“知”，似乎有主客之分，“知”、“被知”之分。无被知之“知”是什么？无知之“被知”又是什么？谁真的把它们分开？还是不分的好。西方到了现代才明白这个道理。量子力学出现前的西方文化，其出发点、逻辑生发处，皆是认定有一恒定的、静止的、不变的认知主体。未行动前，主客早在大脑中分了家。

《道德经》早指出了这种悲哀：

“吾所以有大患者，为吾有身。”

《金刚经》则一再说明：

“无我相，无人相，无众生相，无寿者相。”

“知”又何止是主客双方的事！

近者为因，远者为缘，“宇宙——生命”这个大系统，因因相生，缘缘互连，环扣环，网连网，只不过因缘在某瞬相合，显出一个“知”罢了。

我跨河，我登山……

若无太阳，何“知”之有？

若无空气，何“知”之有？

若无父母，何“知”之有？



《道德经》言：“三十辐共一毂，——当其无也，是有中之无。”

无量因缘合一知，当其元，显知之用。

辐辐还以辐辐，毂是什么？

因归因，缘还缘，“知”是什么？

万事万物，无量之“生”，无量之“知”，莫过是“宇宙—生命”因缘系统的潇洒走一回！

“知”也，“行”也，知行之分，大患在于有“身”，有“相”。“宇宙—生命”系统行时便是知，知时便是行。先知后行，先行后知，是固定出一个主体之后的妄想。在“宇宙—生命”系统本身永是一体的，这个系统：

“强为之名曰大，大曰逝，逝曰远，远曰反。”（《道德经》）

迁流不息，生生不已，变化无常，却“知”光常照，这便是“宇宙—生命”系统。小心：

“五色令人目盲，五音令人耳聋，五味令人口爽，驰骋牧猎，令人心狂……”

佛家则说：“凡所有相。皆为虚妄。见诸相非相。则见如来。”

不是“知”不可靠，“知”便是知，知了也便完了，问题是怕你“知”完后，还要没结没完，迷惑于一个“我”，一个主客之分，一个物事的确定性。

你成了“知”的奴隶了。

全知全能，万知万能，宗教的哄人把戏在东方文化中绝无地位，那是儿童们的幻想，原始巫术宗教正是以这种幼稚的幻想为基础的。

释迦有“十四不正问”之说：

一、世界及我为常耶？二、世界及我为无常耶？三、世界及我为亦有常亦无常耶？四、世界及我为非有常非无常耶？五、世界及我为有边耶？六、世界及我为无边耶？七、世界及我为亦有边亦无边耶？八、世界及我为非有边非无边耶？九、死后有神去耶？十、死后无神去耶？十一、死后亦有神去亦非无神去耶？十二、死后亦非有神去亦非无神去耶？十三、后世是身是神耶？十四、身异神异耶？

释迦答：“无此事实，故不答。诸法有常无此理，诸法断亦无此理……譬如人间？牛角得几汁之乳，是为非问，不可答也。”

孔子则回答得更干脆：“不知生焉知死。”

“东方文化”堵死了一切玄学之门，也堵死了一切宗教神秘之门，也否定了超自然的造物主。

我们十分欣赏南老在《金刚经说什么？》一书中对宗教神秘主义的否定。



翻开一部《楞严经》，七次征心，八还辨见，实是把一“知”字说透了。西方古典文论绝无此精美的篇章。

孔子的表达简短得多：“知之为知之，不知为不知，是知也。”

“知”是知，承认“不知”，也是一种“知”。任何“知”不仅以“不知”为前提，而且其中都包含无量的“不知”。任何“不知”，首先是由于有“知”，绝然无知，不可说“知”，也无法说“不知”。“知”与“不知”高度统一的“知”，才是真知。

大德至善的“宇宙—生命”系统，时而涟漪荡荡，时而浪花四起。这里浊浪排空，那里莺歌燕舞，美、丑、善、真、假、祸、福……到底是什么？左浪推右浪，前浪阻后浪，从来都是一个连一个的平行四边形合力结构，一个组合接一个组合。

佛家将它称之为“帝网珠”。运动着、变化着、普遍联系的“帝网珠”。

在这样的文化中，想为宗教神秘主义找到一个立脚之地，实在太难了。

《道德经》几乎是竭尽全力描写这个“帝网珠”活剧的千姿百态。有人说《道德经》是一部兵书，未必没有道理，历史就是这样一部力与力交接的永不停息的活剧。

这便是东方文化的大思维。

这个大思维，永不拒绝一切现代，因为现代是你拒绝不了的。

这个大思维，永不迷恋一切过去，因为过去你也迷恋不了。

这个大思维，永远乐观瞻视未来，因为“宇宙—生命”系统失不去什么。

这个大思维，不给造物主以地位。

这个大思维，不给垄断者以地位。

这个大思维只崇拜“宇宙—生命”系统本体自身的“本愿”。“本愿”也无愿，只是历史的“矢星”。

我真不相信，这样的大思维与什么文化有抵触，容纳不了什么。

东方文化成了今天这个样子，是不是我们自己走入了“误区”？

我也奉劝一切唯物主义者，东方文化不是你的异类，可能比你更彻底。

六

东方文化永远给“不知”留有地位。

孔子“敬鬼神而远之”并非是相信鬼神的实有性，而是给“不知”留了一个



地位，对于“不知”冠一个“鬼神”的名字，有何不可？“子不语怪力乱神”也说明了孔子忠于自己的学说。“怪力乱神”这些词既然传之甚远，不必贸然否定，但他是“未知”，更不可肯定，暂且存疑也没有什么坏处。

如果多读几遍《道德经》、《庄子》，你会发现“鬼”、“神”之类概念的人间意义。

佛学就复杂得多了。

早在佛学产生之前，中国文化已经从原始神秘的巫术宗教文化中走了出来。中国人用“仁”、“义”、“礼”这些人间概念来论天说地，就是一个明证。孔子的“仁”作为一个范畴，是直指“宇宙—生命”系统本体的，当然也包含人本身的道德。在孔子那里，“宇宙—生命”系统与个体人的生命活动是不可分的，不过是在表述时有时偏于本体，有时偏于个体。读《论语》等作品时，要细细辨认。朱熹把二者绝对同一，“仁”、“义”之类作为人必须遵循的道德，是孔子学说的庸俗化。若人真有什么需要永恒遵守的东西，天就不是“仁”，是“不仁”了。孔子绝不犯这种诬天的错误。

释迦诞生的时代，印度婆罗门教达到了鼎盛期，当时印度没有其他文化，也没有其他文化符号。释迦牟尼不能不利用当时现行的文化符号，包括表述方法。今人读佛经，不明白这一点，是会出现误会的。

也和孔子一样，释迦也给“不知”留下了更广阔的地位。

在释迦那里，生命的存在形式太宽泛了，根本不单指人、动植物、鬼、神、佛、菩萨……可以说一切存在方式，在释迦牟尼那里都是生命存在方式。《金刚经》中说：“所有一切众生之类。若卵生。若胎生。若湿生。若化生。若有色。若无色。若有想。若无想。若非有想。非无想。”实是包括了一切的存在方式，这一切方式是宇宙的存在方式，也是生命的存在方式。和孔子、老子大致一样，“宇宙”、“生命”这两个概念在东方文化中是不能分家的，说宇宙时，便是在说生命；说生命时就是在说宇宙。南老在解释这一段文字时，把小乘佛教练功夫的“四禅八定”引进去了，在南老的眼中，释迦这段无处不是指的“功夫”境界而言。

文殊、普贤、观音、地藏，非人也非神，准确地说只是体之用。佛经中的大量佛、菩萨、天人……大半是“体”之用。如果是中国古人写佛经，用当时中国文化的概念，当是“仁”、“义”、“礼”、“智”、“信”之类。在佛经中，说是某某来会，有的说的是真人，有的则是用名号提示该经内涵外延的意义。

举一个较易说明的例子，佛教有“七古佛”之说，丁福保指责禅宗的七古佛名号、偈语是伪造的，他也列了七位古佛，似乎他列的是实有之佛。其实，禅



宗的发挥是正确的。七古佛的名号及偈语实指的是在释迦成就之前，即建立佛学前，“宇宙—生命”这个大系统必有七步发展过程，不然“宇宙—生命”系统不会发展到产生释迦这样的人物。至于七位古佛是文明的进步层次，还是实有其人修炼成了佛？这在佛学中没有重要差别。

也许是由于古典作家给“不知”留下了地位，后世的儒、道、释三家一直没能彻底与宗教神秘主义一刀两断，有的甚至有越演越烈之势。道家与道教的区别是人所共知的。禅宗中许多大佬一直企图令佛教从神秘主义中走出来，但从今天的情况看，效果并不明显。奇怪的是儒家，晚期也出现了“儒教”的提法，这怕是大儒们太羡慕和尚道士在民间的地位了。民国以来，“儒教”的呼声日高，怕是想以孔子为旗帜组成一个政治派别吧！

目前，儒、道、释三家的现实状态，不是笔者议论的重点，但凡是一个明眼人是会作出清楚的判断的。

如果想概括一下，我以为可利用“三神化”这个概念，说明“东方文化”的现状。

一曰：宗教神学化。这在儒家的早期，董仲舒是个典型，他把孔子的“天命说”完全神化了。正如上文所说，孔子为了给“不知”以地位，对鬼神存疑，而董仲舒又借天人感应说，把神鬼偷运进儒家学说，对后世影响极大。

“天人感应”说如果是从“宇宙—生命”这个大系统的因缘运动入手，说明人心对本体的感应作用，正好破除神秘主义，对于刚从原始宗教神秘中走出来的人类，应有一定的教导作用。但董仲舒把“天”说成了完全决定的东西，人莫过是当狗，这就大谬不然了。“天人感应说”实在是割裂了天人这一关系的神学目的论。

类似这样的，将“东方文化”神学化的东西还很多，利用《易》做文章的最多。宋儒的世界模式图，也几近神学目的论。

在佛教中这个问题便更严重了。

“净土”学说是佛学区别于儒、道的重要学说，也可以说是佛学中最深刻的东西，可到近现代又成了什么呢？

当代一些人解《佛说阿弥陀经》中“过十万亿佛土，有世界名曰极乐”一句，是这么说的：“过十万亿佛土”即“飞过了十万亿个银河系，那里有一个世界（星球或其他的什么）叫西方极乐世界。那里有一个佛，叫‘阿弥陀’，现正在说法。”只要人们每日持念“阿弥陀佛”名号，临终之时，阿弥陀佛与诸圣众就会把他接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享福。



这与基督教的“天堂”说何异？多的只是借用“银河系”这样的现代科学名词装潢了一下门面。

南老当然不同意这样的提法，他老人家对所谓“持名念佛”有新解，说是要引入“止住”概念，从而使念佛进入“定境”。南老是大家，修行上有成就，我辈不敢妄加议论。但“止住”，念到“一心不乱”，忘了自己、忘了身体、忘了一切境况……与佛学的“净土”学说真是相应吗？不管如何说，南老的说法比上述我们引的一些大法师的观点是要强得多，起码南老不太同意把阿弥陀佛理解为彼岸之佛，这对破除神秘主义是具有好处的。南老大半是想把净土说引出神学化的迷宫。

“过十万亿佛土”的本解应是“超越无量众生心”，佛土者，众生心也。“十万亿”表无量。“过”者，“超越”。即是说一切众生思虑不到的“地方”，有一个极乐世界。这个极乐世界事实上是“宇宙—生命”这个大系统未来发展的理想境界。“西方”者终极之意也，并非真是说地球以西。早在唐代，慧能大师就破过这个疑。“净土说”还是佛学的“就地还家”说，还是从属于佛家的“缘起性空”的根本理论的。如果真如那些大师解释的“净土观”，那我们上边提到的释迦本人确立的“十四不正问”原则就不对了。人死后，肉体留在了地球，那是什么东西到了西方？是灵魂吗？佛家断然否定灵魂说，释迦拒绝回答死后为何的问题。既然不承认灵魂实有，那阿弥陀佛接走了我们什么？这个东西的重量、质量如何？阿弥陀佛怎样飞越十万亿银河系？

佛学的正确观念在这里成了神话。

本文不可能详解“净土说”，但佛学不会编造如此神话。东方文化与神秘主义无缘。

二曰：神圣道德化。最典型的是朱熹的“理学”。

这个体系最大的特点是孔子学说的庸俗化。正如前文所说，孔子的主要出发点是“宇宙—生命”这个大系统，即孔子所说的“天”的本性是“仁”是至德。至德之用，则为“义”、“智”、“礼”。后人多加了一个“信”。上天的“仁”中包含了“义、智、礼”诸用，对于受益者来说，应该尽可能接近这种“天德”，但不可能完全达到，也不用强制达到。因为“礼之用，和为贵。”“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。”在社会生活中是求“和”不是求“同”。“礼”在形而上层次上说就是和谐、合和、中庸。

“克己复礼为仁”。

“克”的本义包含朱熹所说的“克制”义，但主要不是“克制”，而是“完成”、



“完善”义。“复礼”者，即与社会恢复于“和谐”，“礼之用，和为贵”。充分完善自我，又与社会保持和谐。在实现自我的基础上也承认别人实现自我的权利，这一切对于“天”来说，就是“天”的至德——“仁”。天的“仁”，正是承认一切现实存在的合理性，但不是消极的，“君子”——明了道的人，知天命的人，要积极向天之至德靠拢。我们以为这应是孔子的本意。这个本意是与“道”、“佛”两家基本相通的，构成东方文化的根本骨架。我们称东方文化为大思维，就在于东方文化三家的基本学说，都是从“天”、“道”、“佛”的法身本体来说话的。

后人不明白这一点，希望把本属于法身本体即“宇宙—生命”系统整体的德行强加给个体生命的人，这样就把一切颠倒了。理学的根本失误就在这里。“宇宙—生命”本有的至德，都被朱熹们曲解为人必须遵守的道德律令。这才有了“存天理、灭人欲”的荒唐论调。

我们反复说过，在东方文化看来“宇宙—生命”这个大系统是不可分割的，离天莫说人，离人莫说天。天之“仁”，是承认人之“欲”的合理性；佛的戒定慧，正是众生的贪嗔痴，天理与人欲本是一个东西，只是理性上表现为相反而相成。释迦对于人类社会的一切“弊病”，即“恶行”，都看成是生长莲花的原料营养。离“恶行”，无莲花可说。综合释迦的全部理想，他所说的极乐世界与现实人生的差别，只是“唯除五道，诽谤正法”，即一切杀戮应逐渐减少，而每一个智慧生命都应明白天地之大道，即释迦自己已经明白了的东西，只此而已。阿弥陀佛的四十八愿体现出的不是“不贪”，而是“大贪”。不过这“大贪”是在全体生命高度和谐水平上的“大贪”。

“东方文化”着眼的永远是现实人生。

不管是现今的儒，还是现今的道、释，大半把古典作家对“体”的论述，强加给人类。佛家所说的“一心不乱”、享受“清福”，都是指的“体”而言，“金刚”也是借喻“宇宙—生命”系统本身的，根本不是要求人们自己去实践的。个体生命永远不可能是“一心不乱”的“金刚”。所谓成佛，首先是把自己的欲望消融在“宇宙—生命”系统的整体中，即所谓“灭度”、“无余涅槃”。不是“欲望”可以被修行掉。如果一切生命皆是一心不乱，皆是“金刚”，皆无“贪、嗔、痴”，诸法不就有“常”吗？断无此理。

戒律在佛家，一是承续了小乘佛教的东西，要修特异神通，非守戒不可，这也便是原始宗教时代，世界各民族通行的所谓“禁忌”的规范与发展。发展到《梵网经》，戒律不过是佛学中悟道的一个法门。《梵网经》前半部讲的就是



心地法门，后半部才讲戒。在讲戒的同时，释迦一再告诫弟子们“我是已成佛，汝是未成佛，但得如是信，戒品已具足”。《维摩诘经》也反复强调这个道理。真悟了道，又何戒之有？

东方文化不是清心寡欲的禁欲主义文化体系，东方文化极力强调要让人们明白天地之大道。“大学之道在明明德”，这是为了提高生命的文明水平，这与后来的“东方文化”的禁欲主义宣传，完全不是一回事。

既要摆脱原始宗教期的愚昧乱伦及杀戮，又不是禁欲主义，这才是东方文化提倡修德的目的。

“悟道”是主体，“修德”是副产品，后世的儒、道、释三家完全颠倒了这个关系。我们之所以要对南怀瑾先生的《金刚经说什么？》提出异议，也在于南先生没有完全摆脱这一历史弊端。

“道德”永远是具体的，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善恶标准，一个民族有一个民族的美丑原则，价值观念的千奇百怪才令“宇宙—生命”这个大系统婀娜多姿，生气勃勃，从而生生不息。把“道德”神圣化、抽象化，是对东方文化的反动，是近千年来东方文化出现“假道学”现象的根源。

从真理向前跨半步就是谬误。合理的道德教化是历史的需要，矫枉过正便是死寂、呆滞。东方文化就是这样走向呆滞死寂的。

三曰：神秘功能化。这个倾向主要表现在道、释两家。

历史总是具有一定的延续性，东方文化是从东方传统的宗教文明脱胎出来的。和世界所有民族的原始文明一样，东方原始宗教文明对“特异功能”是极看重的，一个人的社会身份几乎是由他具备的特异功能决定的。这当然和全社会抗击自然灾害的能力低下有关，这是世界各民族的历史上都存在的一个阶段，至今非洲、大洋洲，乃至亚洲的不少地区还残存这种文明。

儒、道两家的古典作家几乎不提及这一问题，这大概与中国文明较早脱离原始宗教文明有关。这个历史最少可以上溯到周文王，周人提出的“惟德是馨”的口号，就是针对殷商的“鬼神崇拜”的。“惟德是馨”、“祖宗崇拜”的出现，说明中国人早就开始否定可以用特异功能沟通彼岸神灵世界了。至于后来的道教，大讲修炼之术，和中国古代的养生之道有关，但与老子、庄子绝无关系。应该说是古文明的残余。

佛家事实上也是否认“神秘功能”作用的。《楞严经》几乎是对“神秘功能”的全盘否定。经中借介绍二十五菩萨的修行，由文殊（智慧）一一评价，二十四位菩萨都无法得“圆通”。至于观音菩萨的“修”是怎么回事，经文没有细讲。“耳